

# 地区差异对我国劳动力省际迁移影响的实证研究

陈晨<sup>1,2</sup>, 汪应宏<sup>1,2</sup>, 彭山桂<sup>1,2</sup>, 温秀琴<sup>1,2</sup>

(1. 中国矿业大学环境与测绘学院, 江苏徐州 221008; 2. 江苏省资源环境信息工程重点实验室, 江苏徐州 221008)

**摘要** 以地区差距为切入点, 采用计量分析的方法, 利用 199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和 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以及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数据, 定量分析了迁出地、迁入地的各项社会经济特征对劳动力省际迁移的影响程度, 并得出了中国劳动力由内陆向东南沿海迁移的现象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存在等结论。

**关键词** 地区差距; 劳动力; 省际流动

**中图分类号** F3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08)31-13895-03

## Empirical Study on the Effects of Regional Disparity on the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of Labor Force in China

CHEN Chen et al (School of Environment Science and Spatial Informatics,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Jiangsu 221008)

**Abstract** With regional disparity as cut-in point, based on the data of 1% population sampling investigation in 1995 and population census data in 2000 and the data of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in the relative years, the influencing degree of various social and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outgoing areas and ingoing areas on the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of labor force were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The conclusions such as the migration phenomenon of Chinese labor force from inland areas to southeastern coastal areas would still exist in a future long time were drawn.

**Key words** Regional disparity; Labor force;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 沿海地区的经济因此得到了飞速发展并逐渐与内陆省份拉开了差距。这种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而对我国劳动力省际迁移的影响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

### 1 地区差距与劳动力流动

**1.1 地区差距** 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种有利于部分沿海省份的“非平衡发展战略”。东南沿海首先被选做了重点发展地区, 中国政府在此设立了首批经济特区和经济开发区。这些经济特区和经济开发区吸引了大批的外资, 各类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大量涌现。政府在税收和进出口贸易等方面为这些企业提供了许多优惠政策, 使它们得到了非常迅速的发展, 沿海省份的经济由此得到了很快的增长。在这些地区, 市场机制建立得较为完善, 经济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由于国家这种“非平衡发展战略”的影响, 导致了各省之间发展的不平衡, 尤其是沿海和内陆省份之间, 地区差异尤为明显。下面笔者使用 Theil 系数(即熵)来分析各省发展不平衡的现状。Theil 系数的定义为:

$$T = \sum_{i=1}^N Y_i \ln\left(\frac{Y_i}{P_i}\right) \quad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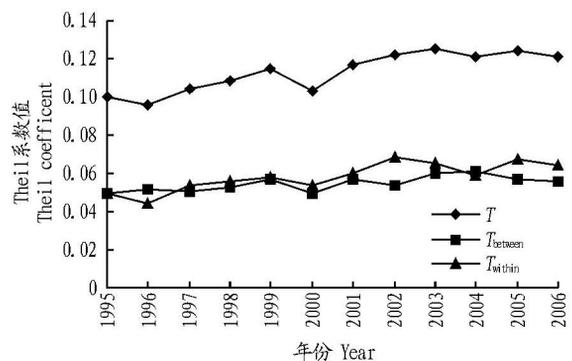
式中,  $Y_i$  为  $i$  省国内生产总值在全国总体中所占份额;  $P_i$  为  $i$  省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份额;  $N$  为省份数。Theil 系数越高, 则表明不平等状况越严重。笔者进一步将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不包括台湾)划分为东南沿海地区、其他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三类地区, 用  $T_{\text{between}}$  表示三类地区间的 Theil 系数, 用  $T_{\text{within}}$  表示地区内部各省之间的 Theil 系数, 则全国的 Theil 系数可表示为地区间不平等和地区内不平等的和<sup>[1]</sup>, 即:

$$T = T_{\text{between}} + T_{\text{within}} \quad (2)$$

$$T_{\text{between}} = \sum_{j=1}^3 Y_j \ln\left(\frac{Y_j}{P_j}\right) \quad (3)$$

$$T_{\text{within}} = \sum_{j=1}^3 Y_j \sum_{m=1}^{m_j} Y_m \ln\left(\frac{Y_m}{P_m}\right) \quad (4)$$

由于数据来源的限制, 笔者无法追溯至改革开放初来讨论地区差异渐变的情况, 因此只能以较晚的时期的数据来说明地区差异的现状。笔者以 1995~2006 年各省相关数据计算出的  $T_{\text{between}}$  和  $T_{\text{within}}$  值, 来说明这个问题。由图 1 可知, 相对于人口分布而言, 各省国内生产总值分布的不平衡( $T$ )在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但在几个时期有一定程度的下降。Theil 系数的分解表明, 地区发展不平衡程度的几次下降主要都归功于沿海和内陆各省内部不平衡( $T_{\text{within}}$ )的缩小。这种地区内部各省之间发展趋同的趋势一直保持到现在, 然而地区间的不平衡( $T_{\text{between}}$ )在 2004 年之前总体呈上升趋势。这种地区间的不平衡成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全国范围内省际不平衡扩大的主要原因。因此, 笔者认为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沿海和内陆地区内部的内质性有所提高, 但沿海和内陆地区之间在发展水平上差距却有了显著的扩大。



注: 资料来源于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Note: The data are from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in the relative years.

图 1 1995~2006 年 Theil 系数的演变

Fig. 1 The evolution of Theil coefficient from 1995 to 2006

**1.2 劳动力的省际流动** 如前文所述, 沿海和内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在不断扩大。按照发展经济学的理论, 迁移是劳动者对更好就业机会或更高收入的一种回应<sup>[2]</sup>。因此为追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和更高的收入, 大量劳动力由内陆

**作者简介** 陈晨(1985-), 女, 山东临沂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资源经济学理论。

**收稿日期** 2008-08-04

省份流向东南沿海。笔者列出了 1995~2000 年省际劳动力迁移的主要迁移流。从表 1 中可看出四个现象:一是迁出地和迁入地大都是人口规模较大的省份;二是对外开放程度高,经济发展活力大的省份对人口迁移有很大的吸引力,如广东;三是经济发达的省份人口迁出较少;四是相邻省份之间的迁移强度较高,最强的迁移流是与引力中心相邻的省份向该中心的迁移,如湖南 广东,广西 广东,江苏 上海,河北 北京。根据上述现象并结合一些已有研究成果笔者提出一个假设即人口规模、地区对外开放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农村非农产业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是影响劳动力迁移的主要原因。

表 1 1995~2000 年省际主要迁移流

Table 1 Main migratory flow among provinces from 1995 to 2000

迁出省	迁入省	迁移数 万人
Outgoing provinces	Ingoing provinces	Migratory number
湖南 Hunan	广东 Guangdong	248.8
四川 Sichuan	广东 Guangdong	174.0
广西 Guangxi	广东 Guangdong	162.9
江西 Jiangxi	广东 Guangdong	121.3
湖北 Hubei	广东 Guangdong	114.9
河南 Henan	广东 Guangdong	80.9
安徽 Anhui	江苏 Jiangsu	75.3
安徽 Anhui	上海 Shanghai	68.6
江西 Jiangxi	浙江 Zhejiang	61.3
安徽 Anhui	浙江 Zhejiang	56.1
江苏 Jiangsu	上海 Shanghai	47.4
贵州 Guizhou	广东 Guangdong	45.4
江西 Jiangxi	福建 Fujian	42.0
河北 Hebei	北京 Beijing	37.4
四川 Sichuan	浙江 Zhejiang	35.5
安徽 Anhui	广东 Guangdong	28.6
四川 Sichuan	新疆 Xinjiang	27.7
四川 Sichuan	福建 Fujian	26.1
河南 Henan	新疆 Xinjiang	24.7
四川 Sichuan	云南 Yunnan	24.6

注:数据根据 199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和 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整理而得。

Note: The data were obtained according to 1% population sampling investigation in 1995 and population census data in 2000.

## 2 实证分析

针对上文提出的假设,笔者将使用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利用 199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和 2000 年人口普查 2 个时段的数据,研究中国劳动力省际迁移的主要影响因素。

**2.1 模型的建立** 笔者从重力模型(Model of gravity)出发来解释劳动力在地区之间的流动。该模型强调人口的空间分布,将迁移视为一系列结构参数的函数,如迁移方向、迁出地和迁入地的人口规模及联系等。

传统的重力模型只考虑 2 个变量:迁入和迁出两地的人口规模(引力变量)和两地的距离(斥力变量)。用公式表达如下:

$$M_{ij} = A \frac{P_i^a P_j^b}{D_{ij}^d} \quad (5)$$

式中, $M_{ij}$ 为*i*地到*j*地的迁移流; $A$ 为常数; $P_i$ 和 $P_j$ 分别为*i*地和*j*地的人口数; $D_{ij}$ 为*i*地和*j*地之间的距离; $a, b, d$ 为

待估系数。

许多研究表明,传统的重力模型对两地间迁移流的决定因素有较强的解释力<sup>[3]</sup>。但是,影响迁移的不仅仅是人口和距离,还有很多其他的影响因素。忽略这些因素必然导致模型的解释力下降,影响模型的意义。因此笔者认为,除人口和距离外,还应当引入迁出和迁入地的其他特征。以 $\{X_i^{a_k}\}$ 表示迁出的一系列特征,如人口规模、人均收入等,以 $\{X_j^{b_k}\}$ 表示迁入地的一系列特征,则扩展后的重力模型可以表示为:

$$M_{ij} = A \frac{\prod_{k=1}^k X_i^{a_k} \prod_{k=1}^k X_j^{b_k}}{D_{ij}^d} \quad (5)$$

将(5)式两边取对数,可以得到一个线性方程:

$$\log M_{ij} = \log A + \sum_{k=1}^k a_k \log(X_{i,k}) + \sum_{k=1}^k b_k \log(X_{j,k}) - d \log(D_{ij}) \quad (6)$$

将 $\log A$ 视为常数项,再加上随机项 $\varepsilon_i$ ,就可以得到计量经济学方程:

$$\log M_{ij} = C + \sum_{k=1}^k a_k \log(X_{i,k}) + \sum_{k=1}^k b_k \log(X_{j,k}) - d \log(D_{ij}) + \varepsilon_i \quad (7)$$

**2.2 数据和变量说明** 到目前为止,省际劳动力迁移流的数据共有 6 个来源:1988 年生育节育调查;1992 年生育节育调查;1987 年人口抽样调查;1990 年人口普查;199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2000 年人口普查<sup>[4]</sup>。笔者以 199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和 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两个时段的数据来分析现状条件下劳动力省际迁移的影响因素。

根据前文提出的假设,笔者选取了迁入、迁出地的相关特征,引入的解释变量如下:

(1) 地区进出口总额(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占全国生产总值的百分比。笔者用该指标来衡量该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

(2) 各省人口数。笔者将从迁出和迁入地两方面来分析人口规模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

(3)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笔者用该指标来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个人收入水平。

(4) 暂住人口比重。由于户籍制度的影响,绝大多数农村迁移人口是以暂住人口的身份居住在迁入地的。而这种非户口迁移主要受劳动力市场的影响,通常表现为劳动力市场越发达的地区暂住人口越多。因此,这个指标可以衡量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同时,由于迁移人口通常是在迁入地的非正规部门中实现就业的,因此这个指标又可以衡量迁入地非正规部门的发展水平。

(5) 农村中非农劳动力的比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镇企业飞速发展并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制约劳动力省际流动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此笔者引入该指标来反映乡镇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省际流动的影响。

(6) 迁入和迁出地两省会间的直线距离。笔者用该指标来反映迁移成本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

以上各种指标来源于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需要说明的是,1995~2000 年的人口迁移数是 5 年迁移数的累积,迁移可能发生在 5 年内任何时段。因此为避免变量的内生性,解释变量的取值是 1995~1999 年的平均值,也就是比迁

移期提前 1 年的 5 年内的平均值。

### 2.3 实证结果及分析 利用以上数据,运用推导的计量经

济学方程式,可以定量地分析地区社会、经济特征对劳动力省际迁移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1995~2000 年省际人口迁移的回归结果

Table 2 Regression results of provincial population migration from 1995 to 2000

迁出省 Outgoing provinces	总迁移劳动力回归 Overall migratory labor force regression	城镇迁移劳动力回归 Town migratory labor force regression	农村迁移劳动力回归 Rural migratory labor force regression
对外开放程度 Opening degree	-0.362 <sup>**</sup> (-5.21)	-0.067 (-0.85)	-0.316 <sup>**</sup> (-4.19)
人口规模 Population scale	0.995 <sup>**</sup> (26.11)	0.772 <sup>**</sup> (17.22)	1.211 <sup>**</sup> (19.42)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Town disposable income per capita	0.521 <sup>**</sup> (6.44)	-0.546 <sup>**</sup> (-4.11)	0.925 <sup>**</sup> (5.28)
暂住人口比重 Temporary population proportion	0.489 <sup>**</sup> (7.17)	1.526 <sup>**</sup> (6.11)	0.045 (-1.096)
农村非农劳动力比重 Rural non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proportion	-0.213 <sup>**</sup> (-2.99)	-0.551 <sup>**</sup> (-6.02)	-0.84 <sup>**</sup> (-5.40)
迁入省 Ingoing provinces			
对外开放程度 Opening degree	0.428 <sup>**</sup> (3.08)	0.231 <sup>**</sup> (4.18)	0.277 <sup>**</sup> (2.98)
人口规模 Population scale	0.885 <sup>**</sup> (16.15)	0.811 <sup>**</sup> (25.01)	0.934 <sup>**</sup> (15.26)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Town disposable income per capita	1.529 <sup>**</sup> (6.25)	1.521 <sup>**</sup> (4.58)	1.226 <sup>**</sup> (7.09)
暂住人口比重 Temporary population proportion	0.766 <sup>**</sup> (3.14)	0.643 <sup>**</sup> (5.48)	1.145 <sup>**</sup> (8.19)
农村非农劳动力比重 Rural non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proportion	-0.422 <sup>**</sup> (-6.39)	-0.24 (1.02)	-0.614 <sup>**</sup> (-8.65)
省际距离 Interprovincial distance	-1.252 <sup>**</sup> (-26.87)	-1.112 <sup>**</sup> (-19.13)	-1.365 <sup>**</sup> (-18.51)
常数 Constant	-23.145 <sup>**</sup> (-9.11)	-12.451 <sup>**</sup> (-7.28)	-13.441 <sup>**</sup> (-6.55)
R <sup>2</sup>	0.623	0.562	0.741

注:括号内为  $t$  检验值; \*\*表示结果在 1% 水平有极显著差异; \*表示结果在 5% 水平有显著差异。

Note: The data in the brackets are  $t$  test values; \*\* means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1% level and \* mean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5% level.

通过对表 2 中回归结果的分析,可以得出下面结果:

(1) 对外开放程度在迁出省呈显著的负向作用,而在迁入省呈显著的正向作用。这说明对外开放程度高的省份,迁入劳动力多,迁出劳动力少。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省份外向型经济发达,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这些就业岗位不仅解决了大量本省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也对外省劳动力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这个结果是符合中国对外开放发展的现实的。从表 1 中可见,这一时期主要的省际迁移流集中流向东南沿海,其中以广东最为集中,其次分布于沪、苏、浙,这些地区都是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地区。

(2) 无论是迁出地还是迁入地,人口规模的作用都显著为正。这证实了人口规模对省际劳动力迁移的双重作用即人口规模在迁出地形成一种推力,同时又在迁入地形成一种拉力。若迁入、迁出地都是人口大省,则迁移就最终取决于其他一些社会经济因素。

(3)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城镇劳动力迁移的作用在迁出省为负,在迁入省为正。这说明城镇劳动力的迁移明显是受收入差距的影响。而对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回归中,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在迁出省和迁入省均为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与一般的理解有些出入。在前文中笔者假设该变量代表的是该地区发展水平,这个结果就意味着农村劳动力迁移更有可能发生在经济发达的地区之间。这可以理解为农村劳动力除了受收入差距的影响外,还要受迁移成本的影响,而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克服迁移障碍(成本)的能力显然比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劳动力要强得多。

(4) 作为城市非正规部门发展水平代表的暂住人口比重对城镇劳动力迁移所起的作用在迁出和迁入省都是正向的。而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则只是在迁入省为正,在迁出地不起作用。对迁出地来说,由于暂住人口主要是集中于城市,而这部分人本身流动性就较大,因此其比重越大,迁出的概率就

越大。而农村人口不具有这种特性,因此迁出地的暂住人口比重对农村劳动力迁移不起作用。从迁入地来看,外来迁入者无论是城市迁移劳动力还是农村迁移劳动力,他们大部分都是以前住者的身份在非正规部门中工作的。而迁入省暂住人口比重越高,表明其劳动力市场发育得越完善,非正规部门发展得越好,因此能对外来人口有更强的吸引力。

(5) 从回归结果来看,用来考察农村非农产业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影响的农村非农劳动力比重在迁出省有明显的负向作用。这说明农村非农产业吸收了本地的劳动力,降低了外迁率。而农村非农劳动力比重在迁入省对农村劳动力迁移不起作用,这说明农村的非农产业主要是解决该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对外省劳动力的吸引作用有限。

(6) 作为迁移成本代表的两省省会间的距离对劳动力迁移所起的负向作用非常明显,这个结果是符合实际的。一般来说,距离越远,迁移的货币成本(如交通费用)和心理成本(地域间文化、语言和生活习惯的差异)就越高。此外,距离遥远还可能导致信息的不完备,增加了在迁入地的工作和收入的不稳定性,从而提高了迁移成本<sup>[5]</sup>。

### 3 结论与讨论

(1) 中国对外开放对省际劳动力流动有重要影响。外向型经济能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既能解决本地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也能吸引大量的外来劳动力。

(2) 较大的人口规模对劳动力迁移具有双重的作用,一方面会对本地劳动力构成推力,一方面也会对外省劳动力构成拉力。

(3) 收入差距是劳动力流动的一个重要动因。

(4) 农村非农产业的作用主要是吸收本地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降低其外迁率,而对外省劳动力的吸引作用不大。

(5) 暂住人口比重大的地区对外省劳动力具有较强的吸

(下转第 13912 页)

指标刻画了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的现状和需要努力的方向与目标。

**3.2 涉农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 在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到一定程度后,涉农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成为农村信息化建设的关键,是全方位地为农民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服务,打造现代农业的必要前提,在乡镇一级建立农民自己的网站并提供有当地特色的信息是反映信息资源丰富度的指标,在此以乡镇网站年人均点击数表示;年人均信息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反映农民对信息的消费能力和重视程度,而每年农业技术推广应用项目数则反映各级政府对现代农业的推广力度和效果;信息采集上传数(以信息的条数记)反映农民进行信息交流的积极性。

**3.3 农村信息化保障机制** 农村信息化建设需要在制度、财力和人员等方面提供长期稳定的保障,形成农村信息化推进的长效机制。在此选取信息收发制度、村级信息人员配备和信息化经费投入占财政支出比重反映保障机制的建设状况。

**3.4 信息化效果** 信息化建设的核心是解决“三农”问题,但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保持可持续发展,既要计算短期的经济效果,又要考察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因此,在刻画短期经济效果时,可以用信息化实施前后的农业产值年增长率对比描述信息化促进农业增效情况,以农民增收速度的对比反映信息化促进农民增收效果;在刻画促进可持续发展效果时,用人均污染排放量(以三废排放量计算)对比反映环境保护的状况,万人违法案件数等对比反映文明程度的提高。“管理民主”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目标,借助信息化手段增加办事程序和结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是农民的民主意愿和客观要求,因此选择该指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信息化建设对民主建设的改进情况。

**3.5 信息化特色** 在借鉴国外和发达地区农村信息化成功经验的同时,各地区应充分调动农民、企业和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结合当地区位、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特点,创建信息化特色。在此,从两个方面考察:一是信息化示范家庭是否起到带动作用;二是在信息处理、信息传播和信息服务等方面是否紧扣当地实际,体现出特色。

#### 4 新农村信息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应用

新农村信息化效果评价是对农村信息化建设定位的需要,同时也可以为各级政府确定不同阶段的发展目标提供重要参考,在具体评价时,各地区可以组织相关专家对各项指标确定等级和得分,最后计算出总得分(信息化特色单列),等级分为A、B、C、D 4类,在评价指标体系中给出了A、C类标准,介于A、C之间的为B类标准,在C类之后的为D类标准。在29个观测点中有25个观测点是定量的,专家直接根据分值打出等级,4个定性观测点需要专家评定等级。评价出各观测点得分后,对前4个一级指标进行加权平均(同一个二级指标下的观测点权重相同)得出总分,由总分再确定等级。最终等级分为A、B、C、D。有D类观测点和信息化特色等级未能达到B及B级以上的不能评为优秀等级。A、B、C、D对应分值分别为95、80、65、50;各得分与等级对应关系为90为A,[75,90)为B,[60,75)为C,<60为D。在评价各地农村信息化效果时可以在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根据变化适时对指标体系作调整(如5年调整1次)。

评价结果应在相应媒体上发布,以便调动地方政府、企业和农民对农村信息化建设的积极性,使农村信息化建设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的利器,最终实现城乡信息一体化。

贵州省将以此为标准在未来的1~2年中对农村信息化建设效果进行评价并定期在相关媒体上发布评价结果,一方面使农村信息化建设进一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另一方面可以促成在保证特色的同时,使各地区准确把握农村信息化所处的程度,确定建设目标,统一建设标准和重点。有理由相信,有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农村信息化建设必将展现出美好的前景。

####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N]. 2005.
-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R]. 2006.
- [3] 国务院信息办. 加快农村信息化发展,缩小城乡差距[Z]. 2005.
- [4] 中共中央国务院. 2004~2008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Z]. 2004~2007.
- [5]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2006)[Z].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 [6] 贵州省统计局. 贵州统计年鉴(2006)[Z].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上接第13897页)

引力。

(6)近年来,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开放内陆省份,促进其发展以缩小东西部差距的政策。而这些政策确实也起到了一定效果,这从2004年后Theil系数的发展趋势上可以得到印证。这无疑会对劳动力的省际迁移产生一定的影响。然而由于迁移惯性的影响,劳动力流动格局不会在短期内发生改变,加之沿海省份的经济优势依然明显,因此劳动力由内陆向东南沿海迁移的现象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存在。

#### 参考文献

- [1] ANAND S. Inequality and poverty in malaysia: Measurement and decomposition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142.
- [2] 曾昭阳,唐晓腾. 社会变迁中的农民流动[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4: 32.
- [3] 甘联君,王峻慧. 运用“推拉”模型分析农业劳动力迁移环境因素[J]. 生产力研究, 2007(6): 24.
- [4] 朱农. 中国劳动力流动与三农问题[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 148 - 150.
- [5] NARA YANA M R. Policy and non-policy 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inter-regional migration of workers in developing country: Some new evidence based on a polytomous logit model for India[J].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1990 (6): 221 - 235.